



博士文丛·经管系列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 赵林飞 顾庆良 著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 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dustry
Upgrading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赵林飞 顾庆良 著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 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Industry
Upgrading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 / 赵林飞, 顾庆良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308-08789-6

I. ①全… II. ①赵… ②顾… III. ①企业责任: 社会责任—研究 ②企业—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IV. ①F27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9719 号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

赵林飞 顾庆良 著

责任编辑 张 琛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德清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789-6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0571)88925591

序

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转型升级是管理学界和经济学界共同关注的两大问题,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沿着两条平行的主线展开:企业社会责任研究重点在于对其本质、动因与绩效的探讨;产业转型升级的研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其视角从全球商品链到全球价值链再到全球产业网络,涉及经济全球化进程、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产业与企业战略的运营等,包括国际贸易自由化原则与贸易磨擦、公平贸易与公平竞争、区域经济发展、国际竞争优势、就业和体面劳动、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等有关国家、产业和企业等关键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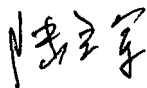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组织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以价值链为基础的全球产业网络。在此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以低劳动成本的优势承接了大量生产制造环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总体上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分工地位。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面临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升级的双重使命。随着中国的入世和纺织品贸易配额的取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规模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巨大产能得以释放,成为全球第一大纺织服装生产和出口国,在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网络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总体而言,大量出口产品来自加工贸易环节,产品附加值较低。当前面对欧美等发达国家买家强悍的侃价能力和严格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加之出口退税调整、人民币升值、原料和劳动力价格以及经营成本的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纺织服装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强化社会责任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压力。然而,我国学术界对此所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远远不够,尤其是把两者结合起来深入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

鉴此,赵林飞博士和顾庆良教授知难而进,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经济管理理论,写成了具有较强创新性的学术专著《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我读后深受启发。该书从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出发,以中国纺织服装业为重点,验证了“做好事把事情做好(Do well by doing good)”的可能性。作者运用CSP(Context-Strategy-Performance)的研究逻辑,

探讨全球产业网络的本质特征、企业社会责任的制约机制和不同分析框架下产业升级内涵的演变。经济性和社会性是全球产业网络的双重特征,作者对发展方式转变从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用企业势力和企业价值反映经济升级,用体面劳动反映社会升级,并选择相应的变量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将企业分为主动适应型和被动反应型两类,比较了不同类型企业的行为表现;并以“申洲”和“雅戈尔”两家纺织服装企业为案例,探讨了中国纺织服装企业在全产业网络框架下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成功路径,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当然,本书的研究还是初步的,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及其相互关系还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开展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而这样的研究对于中国工业经济、尤其是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行业的转型升级以及企业家素质提高和社会转型,无疑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我们期待并相信作者会推出具有更高学术水准和应用价值的新作,也希望学术界、企业界有更多同仁能投入这项研究与实践中,以便对我国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转型升级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浙江省特级专家



2010年12月25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5
第三节 国内外学者关于全球产业网络的研究	11
第四节 研究思路和方法	16
第五节 本书的结构和创新	18
第六节 本章小结	20
第二章 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	21
第一节 全球产业网络的本质	21
第二节 全球产业网络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	30
第三节 全球产业网络的知识转移和扩散机制	41
第四节 本章小结	45
第三章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	46
第一节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46
第二节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约束传递机制	58
第三节 本章小结	69
第四章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产业升级	70
第一节 全球商品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	70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视野下的产业升级	73
第三节 全球产业网络视野下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	78
第四节 本章小结	88

第五章 全球产业网络中的中国纺织服装产业	89
第一节 动态的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网络	89
第二节 中国纺织服装产业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地位	96
第三节 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现状	101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19
第六章 全球产业网络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的实证分析	120
第一节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120
第二节 研究设计	125
第三节 样本描述性分析与信度和效度检验	130
第四节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136
第五节 研究结果讨论	147
第六节 本章小结	150
第七章 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案例分析	152
第一节 “申洲”——OEM 中走出的产业升级的典范	152
第二节 雅戈尔多元化创新协同发展之路	156
第三节 本章小结	162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建议	163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63
第二节 促进中国制造业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建议	166
第三节 研究局限性与展望	167
附录 I 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调查问卷 I	169
附录 II 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调查问卷 II	174
参考文献	182
后 记	200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价值创造和分工体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垂直分离和重构,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经济组织将生产过程分解为若干阶段,根据不同的要素禀赋在全球配置生产资源,形成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为基础的全球产业网络^①(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一方面,发达国家对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作了一次重新定位,将重心由生产制造转移到了创新、设计、市场营销、服务和制造业中高附加值环节等方面;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由于接受了大量从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生产制造等价值环节,从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张辉等,2007)。在此过程中,中国也正在大规模、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已经成为世界分工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碚,2003)。中国产业在新一轮国际分工格局中仍处于较低层次,总体地位还不高,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汪斌,2006)。因此,中国产业如何在全球产业网络中提高国际分工的地位,从而获得更高的附加值,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

^① 似乎国内多数学者将其表述为“全球生产网络”。如 Shahid Yusuf 等(2005);刘春生(2006);刘德学等(2006);鲁邦旺等(2007)。笔者认为,“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所涵盖的范围涉及特定产业的设计、生产、营销和物流等所有环节,而不仅限于生产环节,用“全球产业网络”一词更合适。因此,在本书中采用“全球产业网络”的表述。同样的,文嫣(2005)在其博士论文中也采用了“全球产业网络”的表述。吴晓波等(2007)则用了“全球制造网络”的表述。

自 20 世纪 20 年代起,资本的不断扩张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如贫富分化、社会穷困,特别是劳工问题和劳资冲突(刘俊海,1999)。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的国际化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资本地位不断上升,而世界劳工的地位在不断下降,因此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劳动问题(常凯,2002)。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在全球跨地域流动以寻求最大的利益,跨国公司将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世界范围的资源流动和生产使得跨国公司不受当地劳工立法的制约,减少了对生产工人的直接管理与保障。同时,跨国公司不断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的制造商。在跨国公司的这种“订单转移”的策略下,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为了争取到订单而不得不陷入一种“向下竞争”(Race to Bottom):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强制加班、严格管理、劳工权益缺乏保障,同时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兰荣国,2006)。资本在全球流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活动造成了发展中国家工人工作条件和劳工利益的“向下竞争”,结果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内劳工状况的全球性恶化(余晓敏,2006)。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消费者、工会、学生组织、跨国非政府组织批评跨国公司的“血汗工厂”,并纷纷发起“反血汗工厂”的运动(Anti-sweatshop Campaigns)。自 20 世纪 60 年代尤其是 90 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运动(张忠,2005),个体的利益相关者、贸易联合会、非政府组织等对公司按社会责任方式运作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要求跨国公司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在赚取利润的同时,应主动承担对环境、社会和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谭深、刘开明,2003)。受全球化和竞争的双重压力,跨国公司也通过制定行为守则(Code of Conduct, COD)来规范其国内和国外的经营活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领导者也通过制定相应的规则(如 COD、SA8000 认证)来约束其各生产环节中成员的行为。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当今社会最流行的概念之一(Kagnicioglu & Kagnicioglu, 2007)。

以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纺织服装产业为例,随着中国的人世和扭曲的全球纺织品贸易体制——多边纤维协定^①(Multi-Fiber Agreement, MFA)的取消,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规模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巨大产能得以有效释放,成为全球第一大纺织服装生产和出口国,在全球纺织服装产业网络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总体上来说,大量出口产品来自加工贸易环节,品牌贡献率较低^②,服装

① MFA/ATC 是设计通过限制更有竞争力的供应商的进口(比如中国)以保护美国和欧盟的国内产业(Thoburn,2009)。

② 资料来源:2008/2009 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第 232 页。

出口单价也出现下降的趋势^①。在全球商品链中中国强于生产却弱于流通,强于产品弱于品牌,强于单品加工弱于系列设计和商品策划,缺乏主导权和议价权。在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只获得很小部分加工附加值,而服装及终端产品十分之九的附加值被设计师品牌、零售商和服装品牌拥有者占有。在全球产业网络框架下,面对着欧美等发达国家买家强悍的侃价能力和严格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加之出口退税调整,人民币升值,原料、劳动力以及经营成本的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纺织服装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此同时,“劳动力”问题成为困扰中国纺织服装业发展的一大主要制约因素。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地方政策导向变化等因素导致我国部分纺织服装企业关停,但“劳工荒”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江苏、浙江、福建等地,“熟练工”依然存在较大缺口和隐患^②。解决“民工荒”的主要路径只能依赖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改善劳动环境,提高员工的社会福利和工资水平。这就意味着企业增加了更多的劳动力成本,这又给以低成本为优势的加工企业带来了更大的困扰。

2010年世界知名企业富士康的“多连跳事件”是企业转型升级和企业社会责任困境的极端和集中体现。作为一家优秀的代工企业,富士康构建了“高品质”(“技术领先的客户化体现”、“客户快速响应”和“总成本领先”)的竞争优势^③,在这样的战略选择下,为了与上端研发产业及下端市场接口,不得不在制造环节加大设备和技术投入,而对人工成本进行严格控制,从而降低总成本。但随着产业发展升级,制造环节的利润率越来越低,由2000年前后的20%左右下降为目前的5%左右^④。据美国权威市场调查机构iSupply提供的数据表明,富士康给苹果加工一台iPad,费用仅为11.2美元,而平均成本为260美元的iPad,在美国最低售价为499美元,富士康的代工费仅占售价的2%,少得可怜^⑤。这种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链布局和竞争压力传递机制,直接传导到产业链最底层的劳动者身上^⑥。造成整个产业系统持续的关键问题在于:已有劳动法的国家执法的缺失;不足以维持生存的低工资、过多或强制性的加班;充

① 资料来源:2008—2009中国服装行业发展报告,第59页。

② 资料来源:2008/2009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第116页。

③ 资料来源:“极致”的管理,极端的“表达”——“富士康事件”背后的管理困局专家研讨沙龙(姜汝祥),中国经营报,2010-05-31。

④ 资料来源:“极致”的管理,极端的“表达”——“富士康事件”背后的管理困局专家研讨沙龙(吕峰),中国经营报,2010-05-31。

⑤ 资料来源:“极致”的管理,极端的“表达”——“富士康事件”背后的管理困局专家研讨沙龙(刘步尘),中国经营报,2010-05-31。

⑥ 资料来源:金碚.从富士康事件中吸取教训,中国经营报,2010-05-31。

分的劳动者管理代表的缺失等^①。劳动者的压力无处传导就用极端的“跳楼”形式表达,惨痛地体现了代工模式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在两难困境的情景下,中国制造业应该如何解题?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作为一种投入转化为产出,使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企业社会责任能否提高本地供应商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地位,从而获得更多的议价权?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作为供应商与买家、供应商与员工之间的凝化剂,使得企业的网络组织更为稳定?这些问题围绕着“企业社会责任能否促进产业升级”这一焦点问题展开,需要学术界作出解答,为企业界走出困境指明方向。

二、研究意义

现有的研究主要沿着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两条平行的主线展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重点在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形成与发展、动因及其绩效;产业升级的研究框架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断深入,从全球商品链到全球价值链再到全球产业网络,重点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问题,升级路径及其模式和内涵都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中(Zhao & Gu, 2009a)。以 Gereffi 为代表的学者基于全球商品链的视角以东南亚的服装产业为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本地供应商一条从组装(Original Equipment Assembling, OEA)—委托加工(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OEM)—自主设计和制造(Original Designing and Manufacturing, ODM)—自主品牌制造(Own Brand Manufacturing, OBM)的产业升级路径(Gereffi, 1999; Bair & Gereffi, 2003; Humphrey, 2004)。全球价值链的分析框架使产业升级的研究重心转移至价值链不同环节的价值的创造、分化及其俘获上,价值链的全球化使得设计、生产和营销等不同的环节更加协同(Barrientos et al., 2008)。全球价值链视野下的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有四种模式: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Humphrey & Schmitz, 2002),不同模式有着不同的创新行为和绩效(Kaplinsky & Morris, 2002)。全球产业网络的分析框架与前两者相比,除了从商业视角关注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活动外,更从社会视角关注其对人们生活的影响(Barrientos et al., 2008),更多关注生产和雇佣关系的社会和制度嵌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地供应商(Herderson et al., 2002)。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升级的研究对象超越了制造业的范围向农产品、服务业(如旅游、商务外包等)延伸,原有的“产业升级”的概念用更宽泛、更具包容性的概念“经济升级”所替代,研究的重心也逐渐转向

^① Forstater M. Sectoral coverage of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Implications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on the textile and clothing sector.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 Sectoral Activities Programme, 2010:5.

社会升级问题,关注劳动者作为社会行为者的能力和权益的提升及其雇佣质量的提升(Barrientos et al., 2008)。

国内众多学者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研究了纺织服装产业升级路径及其策略(黄永明等,2006;刘芹、陈继祥,2006;胡丹婷、汪佩霞,2007;梁文玲、李鹏,2008;卓越、张珉,2008等),而对纺织服装业的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关注不多。有实证研究表明产业升级与劳动力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工作环境的改善等暗含着关系(Bair & Gereffi,2001),产业升级产生一定的劳动力市场收益(如雇用的增加,工作质量及劳动安全的提高,培训和技能的提升,对劳工标准更多的关注等)(Remesh,2007)。Ahmed和Peerlings(2009)对孟加拉国的纺织服装业的研究表明,企业对劳动者生产条件和服务的改善,可以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不仅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和福利,也给企业带来了更高的收入,使其更多地投入到改善劳动环境中。Zhao和Gu(2009c)对宁波纺织服装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企业不同的经营模式与体面劳动的一些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关系。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与经营模式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Zhao & Gu,2009a)。但企业社会责任与产业升级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进一步从理论上深入探讨并得到实证检验。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在全球产业网络的框架下,从理论上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构建理论模型,通过中国纺织服装业的调研进行实证检验,得到相关的结论。研究结果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升级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和指导意义。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企业社会责任和产业升级是本书两个核心概念,涉及的文献颇多,本节仅择其要,对两个概念的演变进行梳理,作为本书研究的基础。总的来说,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经历了从“责任”到“战略”的演变,而对产业升级的研究则从一般理论转向产业实践,其研究视角出现微观化趋势。

一、企业社会责任观念:从“责任”到“战略”

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演变可以看成是两条平行路径的结果(Vurro,2006):一是政策制定者和组织为推广企业社会责任思想而推出的概念。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可持续发展协会(WBCSD)、国际劳工组织(ILO)、欧盟(EU)等。二是学术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模糊认识到

企业社会责任作为管理工具和行为指导原则的明确界定的演进过程。

在学术文献中,CSR 是个“备受煎熬”的概念(Godfrey & Hatch, 2007),Carroll(1999)回顾并讨论了学术文献中 25 个关于 CSR 的不同定义。企业社会责任最早的定义是由 Bowen(1943)给出的,指“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 and 价值,寻求其政策,做出其决策,或采取令人合意的行为底线的义务”(Perrini et al., 2006)。Carroll(1991)的金字塔模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的期望。Donaldson 和 Preston(1995)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则包含了利益相关者的思想。Kotler 和 Lee(200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通过企业自主决定的经营实践和企业资源的贡献而提高公共福利的义务。Sacconi(2006)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基于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治理的延伸模型。刘俊海(1999)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应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卢代富(2002)则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陈永正(2004)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归结为企业与股东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对于企业利益的实现机制的重构。

不同的学者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演变过程。De Bettignies(2002)回顾总结了 1955—2002 年间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的含义,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划分为十个阶段:企业慈善(1955)、企业伦理(1960)、企业社会责任(1965)、利益相关者模型(1970)、企业社会响应(1975)、企业社会绩效(1980)、企业社会公正(1985)、可持续发展(1990)、三维基本底线(1995)和企业公民(2002)。Juholin(2004)根据 Frederick(1994)和 Vercic(1994)的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五个阶段和类型:CSR0(Public Responsibility 1900s—1930s),强调公共利益;CSR1(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1930s—1970s),企业社会责任,关注普通公众;CSR2(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veness 1970s),企业社会响应,重点在于公司社会关系管理;CSR3(Corporate Social Rectitude 1980s),企业社会公正,强调双向均衡的公共关系;CSR4(Corporate Social Reason 1990s),企业社会动机,强调企业的公共关系不仅仅在于有效、正确地管理公司的关系,而且应该完全地参加寻求解决环境问题的路径。沈洪涛和沈艺峰(2007)则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演变划分为五个过程:狭义的企业社会责任(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公司社会回应(20 世纪 70 年代)、公司社会表现(20 世纪 80 年代)、利益者相关理论(20 世纪 90 年代)、公司公民(21 世纪初)。

学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也由最初的“责任”转向“战略”思想。Kotler 和 Lee(2005)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经历了从“职责到战略的转变(A Shift from

Obligation to Strategy)”。Perrini等(2006)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包括战略和公司政策等内容,与企业管理的所有领域产生交互的因果关系,同时也是竞争优势的源泉。Porter和Kramer(2006)认为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成本、限制或慈善行为,更重要的是,通过策略路径,企业社会责任会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产生机会、创新和企业的竞争优势。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战略会产生不同的绩效。姜启军、顾庆良(2008)的研究表明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对企业绩效影响显著的是企业竞争力,对员工流失率、企业声誉有影响且有显著性差异。Zhao和Gu(2009a)对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研究表明主动实施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率。

二、产业升级:从一般理论到产业实践

传统的产业升级理论研究视角相对比较宏观,主要研究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关联。产业结构的发展和演变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发生的经济现象(芮明杰,2005)。产业结构的演变可以带动经济结构增长,而经济增长又可以促进产业结构的加速演变和升级(王述英等,2006)。许多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关联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代表性理论有西蒙·库兹涅茨的总体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理论、罗斯托的主导产业转换规律以及钱纳里的工业经济增长模型。

库兹涅茨提出经济增长因素主要是知识存量的增加、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结构方面的变化。在第三个重要因素——结构变化研究中,不仅考察了产业结构变动与总量增长的一般关系,而且分析了结构变动在不同总量增长时点上的状态。其研究指出,发达国家在现代经济增长时期的总体增长率和生产结构变动率都比以前高得多。首先,假如按人口平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是与新知识和技术革新大规模地应用于生产相联系时,生产结构的变动率大致上也是高的。其次,新知识和技术革新大规模地应用于生产按人口平均产值和生产率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生产结构的高变动率。相反,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变动缓慢,结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小,这表现在:不发达国家传统结构束缚着60%以上的劳动力,使之聚集在传统的农业部门,传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阻碍着经济增长;制造业结构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增长对它提出的要求;需求结构变化缓慢,消费水平低,不能形成对经济增长的强有力的刺激。因此,产业结构的演变是总体增长高速度的必要条件和可能的费用(芮明杰,2005;王述英等,2006)。

罗斯托则认为,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一个产业部门变化的过程,它根植于现代技术所提供的生产函数的累积扩散之中。现代经济增长对技术创新的吸收是一个产业经济部门的形成过程,也是主导产业经济部门依次更替的结果。

主导产业部门之所以能带动其他部门经济增长,不仅因为它本身有相当高的增长率,而且还由于它具有回顾效应、旁侧效应和前向效应。另一方面,引进新的重要技术或者进行技术创新是产业经济结构彼此联系、相互作用而使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果。主导产业的建立和扩展,主要是由于引进新的重要技术,进而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大规模地集结和组合新的生产要素,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同时引起传统产业的改造与更新。因此,经济增长是产业结构不断变化而使其功能不断提高的结果(芮明杰,2005;王述英等,2006)。

钱纳里(1986)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并将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变定义为: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发生的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使用结构的全面变化。多国增长研究表明,一方面,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结构变化造就了增长率先增加而后下降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结构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比对发达国家重要得多,反之劳动力增长对发达国家效果更显著,而投资则是对两组国家都重要的增长因素。制造业加上社会基础设施的崛起,是结构转变后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也是一个升级的过程(厉无畏、王振,2001)。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升级的研究视角出现了微观化趋势。虽然产业升级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产业升级的概念及内涵至今仍然很难完全统一。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产业升级有不同的表述。厉无畏、王振(2001)认为产业升级是产业发展由低级向高级的提升,不仅包括数量的增加,而且还包括质量的提高。产业升级的过程主要涉及三个层面:一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升级过程(可用著名的配第一克拉克定理描述);二是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升级过程(可用工业化阶段理论和著名的霍夫曼定理进行描述);三是各个行业内部,包括传统行业内部的结构升级过程。Porter(1990)认为,产业升级的本质在于当资本(人力和物力)相对于劳动力和其他的资源更加充裕时,国家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发展比较优势。Gereffi(1999a)认为产业升级是一个企业或经济体提高迈向更具获利能力和/或技术复杂的资本和技能密集型经济领域转移的过程。Poon(2004)则将产业升级视为制造商成功地从生产劳动密集型低价值产品向生产更高价值的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经济角色转移过程。尽管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产业升级进行界定,但可以看出产业升级的核心在于技术升级,产业升级的研究对象出现由宏观转向微观的趋势,由国家(区域)层面转向产业层面乃至企业层面的升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全球产业网络的形成使产品的价值创造环节分散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这无疑为发展中国家嵌入价值创造环节、提高生产和创新能力、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带来了机遇。基于此,自20世纪90年

代末,国外学者开始尝试从全球价值链这一崭新视角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问题(张向阳、朱有为,2005)。

在全球价值链中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源于 Gereffi 等人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所作的东亚服装产业研究^①。在全球价值链的视角下,Gereffi(1999a)将产业升级分为四个层次:一是产品升级,即从简单到复杂的同类型产品;二是经济活动升级,包括设计、生产和营销能力的提升;三是部门内升级,如从最终环节的制造到更高价值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也包括供应链的前向和后向联系;四是部门间升级,即从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他指出这一升级框架不仅可用于国家(区域)的升级研究,也可用于产业乃至企业的升级研究。在这个分类的基础上,Humphrey 和 Schmitz(2002)明确提出了一种以企业为中心、由低级到高级的四层次升级分类方法:一是流程升级,通过重组生产系统或是引入高级技术将投入转化为产出;二是产品升级,根据单位增加值转向更高端生产线;三是功能升级,即获得链上新的、更好的功能,如设计和营销,或放弃现有的低附加值功能而集中致力于附加值更高的环节。四是部门间升级,把从一个特定环节中获得的能力应用于新的领域或转向一个新的全球价值链,也称链升级。这种四分法在目前的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普遍认为产业升级一般都依循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功能升级最后到链条升级。这一升级规律基本上可以通过东亚众多国家工业化进程来加以佐证。

20 世纪末期以来,一些学者延续 Gereffi 等人的早期研究成果,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研究产业升级问题。产业升级可以包括价值环节内在属性和外在组合等两个方面的变动,这两方面都连接在同一链条中或不同链条之间的相互关联中(张辉等,2007)。由上可见,西方对产业升级研究的视角较为微观,实质上把企业的生产能力以及竞争力的提高视为产业升级的本源。因此,从全球价值链的理论来看,产业升级就直接表现为企业在一个全球价值链中顺着价值阶梯逐步提升的过程。当然产业升级也有部门维度,并且因不同产业集群的特点而有所差异。中国产业在世界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全球价值链中仅占据附加值较低的环节。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国地方特别是沿海等先发展起来的地区面临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压力也越来越大,基于全球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也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纺织服装业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黄永明等(2006)运用全球价值链的

^① Gereffi 等人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提出全球商品链(Global Commodity Chain, GCC)的分析框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及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产业升级的研究视角也由全球商品链转向全球价值链。在本书第四章中将进一步讨论。

升级分析框架,分析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面临的升级障碍和升级路径选择问题,提出了基于技术能力、市场扩张能力以及技术和市场相结合三种企业升级路径。胡丹婷、汪佩霞(2007)分析了中国服装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并提出了通过制造样衣以提高产品设计能力、品牌国际化以拓展国际市场营销渠道的由价值链低端逐步向价值链高端发展升级路径。赵君丽(2007)研究了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纺织服装产业的升级问题,认为中国服装产业升级可按照 OEM——外包或制造三角^①——OBM 模式进行,升级的关键在于纺织服装企业是否具有创造产品差异的能力。刘芹、陈继祥(2006),梁文玲、李鹏(2008)分别分析了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中国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及企业在全价值链中的地位及升级的策略。卓越、张珉(2008)通过分析全球价值链的收益分配机制,认为国内纺织服装业在通过加入全球价值链以实现产业升级,获取分工收益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道路中,形成了以跨国采购商为主导的俘获式全球价值链。跨国采购商所决定的分工格局以及对升级的控制,将作为代工者的国内纺织服装企业牢牢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使国内代工企业在全价值链中的分配地位日趋恶化,陷入“悲惨增长”。中国服装业只有摆脱跨国采购商的升级控制,培养自己的高级要素,实现由俘获式全球价值链向均衡式全球价值链的转变,才能走出“悲惨增长”困境。

汽车和信息电子等产业的升级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段文娟(2006)、沈涛(2006)分别探讨了汽车产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以及国际分工转换背景下的中国汽车产业的价值链重置和升级问题。文嫣、曾刚(2005)以上海浦东集成电路产业网络为例,研究了全球价值链治理与地方产业网络的升级问题。文嫣(2006)对上海浦东 IC 地方产业网络进行了研究。王如镜(2006)则对苏州 IT 制造业产业集群在全球产业网络内的升级进行了研究。

产业升级的研究还与地方产业集群紧密联系。张辉等对地方产业集群的升级作了大量的研究(张辉,2004a,2004b;张辉,2005a,2005b;张辉、喻桂华,2005;张辉、王缉慈,2006;张辉,2006;张辉等,2007)。黎继子等(2005)探讨了全球价值链下地方产业集群的供应链整合问题。张向阳等(2005)对苏州和温州两类以不同模式嵌入全球产业网络的升级路径进行了研究。朱允卫、董美双(2006)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温州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类不同发展路径的鞋类企业的升级途径进行了研究。汪斌、侯茂章(2006)考察了杭州 14 个典型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状况,探讨了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升级的模式选择和总体思路。汪斌、侯茂章(2007a)进一步分析了浙江杭州区域

^① “制造三角”指拿到发达国家的订单,然后部分或全部外包给其他低工资国家或地区。见赵君丽(2007)。